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11月20日 (第203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美学者：美国正修正对国际体系的参与

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孤立主义者，因为其安全和繁荣依赖于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问题在于这种互动的程度和深度。在特朗普治下，重新协商已经开始。

## 传统基金会发布年度美国军事实力指数报告

目前美军可以在应对单个重大地区冲突的同时，参与多项行动，但无法处理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重大地区突发事件。

# 中美关系

## 美国以“切尼主义”瞄准中国技术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11 月 7 日登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D. Sachs) 的文章称，美国及其部分盟国正利用“切尼主义” (Cheney Doctrine) 攻击中国的技术，夸大风险，引起人们对中国技术的恐慌。

在伊拉克战争前夕，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切尼 (Richard Cheney) 宣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风险哪怕只有 1%，美国也应该采取行动。如今，“切尼主义”再次出现。美国政府认为，由于无法断定中国技术是否安全，美国应该将中国技术视作绝对危险，并采取相应措施。

“切尼主义”要求针对极小的风险采取行动，而不考虑行动背后潜在的高昂代价。而这正是美国领导人目前所做的：他们夸大极小的风险，制造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恐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美国政府对华为的攻击。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恶意后门软件，但美国正在切断华为在美国的市场，并极力阻挠其在全球的业务。正如伊拉克战争，美国最终可能再次毫无缘由地制造一场地缘政治灾难。

若特朗普政府“成功”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技术阵营，那么未来冲突的风险将成倍增加。在国际事务中，如果不依照证据行事，而是引发并利用民众的恐惧情绪，那么前方将是一条不归路。

## 贸易战使中美两伤，其他国家获益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近日登载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经

济学教授凯伦·泰菲尔德 (karen Thierfelder) 等人主笔的报告, 运用全球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分析了贸易战对中美两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影响。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贸易战对中美造成复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对美国而言, 增加的关税被转嫁到美国消费者和生产商身上; 对中国而言, 关税提高了日用消费品的价格, 但对生产商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根据泰菲尔德等人的模型, 美国的进口和出口有所下降, 而中国则将出口从美国转移至其他国家。这使供应链做出反应: 中国增加了对欧洲、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 而这些国家增加了对美国的出口。相较于中国, 美国转移出口并改变进口来源的难度更大, 因为二者都是很难重塑的供应链的一部分。

贸易战还对两国的生产结构产生影响。在所有模拟情景中, 美国的相对产出从农业、制造业和贸易服务转移至其他部门, 非贸易服务的产出相对增加。这反映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合成谬误”, 即试图同时保护多个制造业行业反而会从整体上伤害制造业。

总之, 发动双边贸易战对两国有害无益。全球市场也被打乱, 各个国家必须调整贸易模式以应对卷入贸易战国家高度的保护主义。卷入贸易战的国家都受到损害, 而其他国家则会获益, 因为他们更容易作出相应调整。

### **美媒：特朗普的贸易战走向疯狂**

《彭博社商业周刊》网站 11 月 14 日载文称, 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从一个精心校准的贸易武器走向了“疯狂”。

起初, 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贸易战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 获取迫使中国全面改革经济结构的筹码, 并将痛苦限制在国内企业和消费者身上。但是, 特朗普的贸易团队并未将特朗普的不可

预测性纳入考虑范围内。

20 个月后，特朗普政府一开始使用的策略变得越来越疯狂。与中国的关税战使超过 70% 的双边商品贸易陷入了困境，并引发了中美经济“脱钩”的“幽灵”。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关税战可能会危及美国创纪录的经济扩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项预测，目前的关税将导致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下降 0.8%。

有批评人士指出，至 2019 年年底，美国的贸易逆差将比 2016 年年底特朗普就职前夕多出 1500 亿美元。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关税和出口限制，强化了北京在人工智能和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超过美国的决心。

许多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特朗普的做法太过“即兴”，迫使盟友陷入“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局面，这并不符合他们面临的经济和商业现实。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朱迪·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简单解决问题的政治时代，而这些问题需要复杂而协调的行动。”

### **为何美国共和党眼中的中国由朋友转为敌人？**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者乔·雷奈德（Joe Renouard）近日撰文称，过去四十多年，美国大多数共和党人都积极支持美国与中国接触，而如今，他们几乎一致信奉“中国威胁论”。文章摘要如下：

自 1972 年以来，共和党人普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平衡商界、国家安全界和共和党保守派三种力量的结果。然而，与共和党过去为全球化、自由贸易和中国融入世界秩序摇旗呐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共和党高唱对华强硬的论调。今天的共和党人几乎一致把对国家安全、商业、科技、知识产权、甚至人权的担

忧糅合成一种庞大的“中国威胁论”。

这种转变远远超出了特朗普政府及其发动的贸易战的范畴。粗略看一下国会近期的活动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涉华法案和听证会中，共和党人都是“急先锋”，包括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吉姆·特伦特、吉姆·因霍夫、特德·克鲁兹、科里·加德纳、汤姆·科顿、乔什·霍利，以及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特德·尤奥、威尔·赫德、史蒂夫·查伯特。其中，科顿、霍利、加德纳是较年轻一代议员的代表。由于他们成长于中国崛起的时代，对中国实力的幻想似乎更少，维护过时现状的压力也更小。

也许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共和党亲商派中。过去，北京可以指望两件事：美国企业将代表中国在华盛顿游说；以商业为导向的共和党人支持美中经济一体化。由于北京已经亮明要成为先进技术领导者的意图，那些担心将来会被取代的外国公司为中国游说的意愿下降。共和党人今天并没有完全放弃自由贸易，但他们愿意接受一场贸易战，因为党派忠诚和选举雄心一致引导他们敌视一个更富更强的中国。

自 1989 年以来，中国年均 GDP 增长率达到惊人的 9.49%。美中贸易逆差从 62 亿美元激增至 4195 亿美元。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约减少 500 万，一些学者和智库仍坚称，罪魁祸首是中国贸易而非自动化。尽管美国对华出口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持续增长，但自 2013 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有关中国贸易行为的报告措辞越来越严厉。所有这些因素都令共和党将自己描绘为“对华强硬”在政治上变得更容易被接受。

至于特朗普政府，“中国威胁”的叙述贯穿于成堆的安全、贸易和技术报告中。除了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前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和国务卿蓬佩奥，副总统彭斯也悄然成为针对中国的“打

手”。

如今民主党虽谈不上亲华，但显然没有共和党那么激进。虽然有少数人也加入了反华阵营，如参议员鲍勃·梅内德斯、克里斯·孔斯，以及众议员加里·康诺利，但到目前为止，中国议题一直是民主党总统选举辩论的“冷门”，候选人尚未提出明显有别于特朗普的看法。

### 中美竞争愈演愈烈，中等强国调整政策

《国家利益》杂志近期登载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师阿里·韦耶 (Ali Wyne) 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来仪 (Bonnie S. Glaser) 的文章称，随着美中两国间的竞争加剧，中等强国 (middle powers) 进一步调整政策。

过去 20 年，中等强国对美中竞争的态度可以简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无需做出选择 (2001-2008)。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几乎没有观察人士会想到，亚太中等强国有一天将被迫做出选择。尽管美国要求中国为维护战后秩序作出更多贡献，但两国之间的国力差距甚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并未意识到，加强与美国的外交和军事关系，与同时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之间存在多大的内在冲突。

第二阶段：压力开始增加 (2008-2016)。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到奥巴马离任，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约占美国的 35% 增长到 60%。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的出口国，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其他方面确立了自己作为全球增长主引擎的地位。与此同时，美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战略紧张关系加剧，竞争性力量日益排挤合作性力量。

中等强国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战略野心越发忧虑，但他们也意识到，如果忽视中国崛起的机遇和威胁，将会是一大失误：中国的迅速扩张带来了机遇，但其经济胁迫的外交政策也带来挑战。因此，他们试图在相对衰落、对其安全至关重要的美国与相对崛起、对其增长日益重要的中国之间，最大限度地获得行动自由。

第三阶段：避免做选择（2016-）。尽管这种平衡的尝试可能会继续成为中等强国行为的一个核心特征，但他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试图在塑造中美竞争以及避免竞争对战后秩序造成不利影响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近来，澳大利亚的态度可能预示着一种更加自主的中间力量外交。澳总理莫里森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前夕呼吁本国不要“在一场大国竞争中袖手旁观”。中国对南海进行军事化等行为，加剧了该地区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担忧。同时，中等强国也越来越担心美国的问题。特朗普政府强调双边主义，对国际机构持怀疑态度，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朋友和对手，即使是长期盟友也开始质疑美国的可靠性。除了亚太地区国家外，受到中美关系恶化负面影响的还有欧洲的中等强国。例如，随着华为的扩张，这些国家在 5G 网络选择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如果华盛顿和北京认为，中等强国是两国战略僵局的被动旁观者，那就大错特错。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指出，该地区的小国在管理美中竞争方面“并非完全没有作用”，他们有能力“深化经济合作，加强区域一体化，建立多边机构”。如果中美两国更重视的是相互竞争而非地缘政治稳定，那么其他国家最终将在塑造战后秩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 美国外交

### 特朗普能否终结“无休止的”战争？

《国家利益》网站 11 月 2 日登载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专家特雷弗·斯罗尔 (A. Trevor Thrall) 和约翰·格拉泽 (John Glaser) 的文章称，特朗普在 2016 年与其他 16 位共和党候选人的辩论中曾将伊拉克战争称为“一个可怕的错误”。但是，撇开特朗普的夸夸其谈，他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或其他地区停战方面所做的工作却少之又少。

特朗普为结束无休止战争而进行的各种尝试都遵循了类似的模式。首先，特朗普通常在事先咨询顾问或制定实施计划的情况下，在推特上告诉新闻界，他计划撤出美军。随后，华盛顿外交政策建制派 (有时是公众舆论) 对他的声明做出负面评价。同时，特朗普的顾问们疯狂地说服他改变想法。随着面临的压力上升，特朗普最终向其顾问和政治压力让步，撤军不了了之。一段时间后，特朗普再次尝试，这个循环再次重复。

特朗普立场不断变化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他希望迎合其民族主义支持者，同时影响媒体议程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求，从而减少美国人对“通俄”调查、弹劾调查的关注。而特朗普无法终结这场无休止战争的另一大因素是外交政策建制派的反对。华盛顿仍有一个强烈的两党共识，即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频繁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对维护国际安全、维持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不可或缺。

为了恰当地采取撤军行动，美国将不得不运用巧妙的外交手段，在政治上做出艰难让步，并在过渡期间承担一定的风险。然而，在混乱的特朗普政府，这几乎不可能做到。



##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潜在影响

《外交家》杂志网站近期登载位帕米尔咨询公司战略服务副总裁梅西·郭 (Mercy A. Kuo) 的文章, 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潜在影响。文章摘要如下:

2018 年 9 月, 欧盟发布欧亚互联互通战略, 这代表欧盟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式发生重大转变。欧盟互联互通战略主要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 旨在推广一种替代中国方式的欧洲模式。欧盟委员会的主要担忧似乎与中国在西巴尔干半岛非欧盟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长有关, 也与中国在欧盟内部 (特别是欧盟东部) 以及亚洲的影响力有关。

欧盟及其成员国不太可能进行再平衡, 转向中国和亚洲, 但他们正在寻求增加欧洲的“战略自主权”。通过北约, 美国继续是欧洲主要的安全提供者。欧洲需要美国来制衡俄罗斯。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 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地缘政治上与美国的关系就会比与中国的关系密切得多。然而, 欧盟很可能会设法减少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依赖。从欧洲的角度来看, 美国作为长期伙伴的可靠性不如从前。

未来, 美国可能会对欧洲施加压力, 要求其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 在国际组织内部终止与中国的合作, 或参与针对中国的军事活动, 这些都可能造成严重的跨大西洋紧张局势。

## 特朗普对官僚机构的损害给美国民主带来威胁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登载该智库主席、前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坦 (William J. Burns) 的文章称, 美国民主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假想的“深层国家”, 而是一个机构空心化、公职人

员遭受打击和贬低的“弱政府”。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政府对官僚机构的破坏，如系统性地将职业官员边缘化并削减国务院的预算，导致美国驻外事务处的申请人数降至 20 年来的最低水平。除了政治上的蓄意破坏，特朗普政府的任人唯亲和腐败也对美国民主产生了重大影响。

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国务院的职业专长和承诺对于确保政府的连续性、管理危机和促进美国利益至关重要。但特朗普飘忽不定的单边主义、对专业知识的蔑视及其将外交视为一种自恋行为，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在世界局势更加动荡的今天，外交手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特朗普离任的那一天终将到来，但他对外交和公共服务的不屑所造成的损害将继续存在。现在的问题是，未来美国能否以本届政府摧毁外交的热情来重振外交。

## 美学者：美国正修正对国际体系的参与

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孤立主义者，因为其安全和繁荣依赖于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问题在于这种互动的程度和深度。在特朗普治下，重新协商已经开始。

《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近日登载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经济地理学和国家安全主任尼古拉斯·格沃斯德夫 (Nikolas K. Gvosdev) 的文章称，美国人不会成为孤立主义者，但美国正在重新评估其参与国际体系的程度和深度。

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北部撤军后，共和党议员最初的反应是批评这一决定。这一反应符合国际主义者“前沿接触”(forward US engagement) 的原则，这也是华盛顿解读政策时优先使用的

原则。但后来，当共和党选民基础的反应表明“对库尔德人的背叛”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时，讨论转向了评估什么样的行动路线对美国国家利益最有利。今年 10 月 16 日，国会众议院以 354 票对 60 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谴责特朗普从叙利亚北部撤出美军的决议案。但也有 60 名共和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这表明，居主导地位的叙事——“美国领导人投降了”——占了上风，但特朗普提出的反叙述——“我们为什么要向叙利亚派兵”——也具有吸引力。

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是因为叙利亚问题引发了共和党内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二者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一项评估中，该评估将美国在海外的积极参与和美国的国力和福祉联系起来。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和政府学院教授科林·杜克（Colin Dueck）指出，“特朗普通过定位、强调共和党内部分歧，打破并重新安排了这种预期的格局。”这也对美国的信条——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美国是必要的，美国必须准备好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构成了挑战。共和党的国际主义者可能会从对海外事务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国内和平与安全的起点这一前提来考虑问题，但共和党的民族主义者更喜欢在个案的基础上考量威胁和挑战。

特朗普愿景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现有的国际军事和商业安排对美国带来了不成比例的代价，必须朝着相反的方向调整或重新协商。这种对变化的开放态度——具体表现为政府倾向于突然、破坏性和冲动性举措的领导风格——不应使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不能推进或维护美国的利益（通常是物质和经济层面的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或人道主义层面的利益），共和党的部分选民要求重新协商、甚至抛弃现有的安排（如贸易和盟友等方面的安排）。

有一种倾向认为，特朗普政府是美国外交事务中一段不幸的插曲，这个时刻很快就会过去。人们认为，在某个时刻，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会恢复到它熟悉的老样子。但我们应该对这种自满情绪保持警惕。

正如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最近发布的报告《寻找一种新的叙事：重塑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所指出的那样，两党的美国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必须修正美国对国际体系的参与，重新关注美国对外政策与普通美国人眼前问题之间的联系。人们也怀疑，美国的主权或决策权会落入选民无法触及和控制的机构手中。无论是寻求 2020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人，还是像妮基·黑莉这样未来可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人，都在谈论重新审视自由贸易的好处，或重新考虑美国在海外的承诺等“特朗普式”的主题。

美国永远不会成为孤立主义者，因为其安全和繁荣依赖于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问题在于这种互动的程度和深度。在特朗普治下，重新协商已经开始。

## 美国政治/其他

### 2020 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阵容的特点

《华盛顿观察家报》网站 11 月 4 日载文称，参加美国 2020 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与参加 2016 年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在结构上迥然不同。

在过去两个选举周期中，两党总统候选人的人数较以往大幅增加。过去两党只有 2 到 5 位候选人，而 2016 年共和党有 17 位候选人，今年民主党有 26 位。由于两党长期以来在基本特征上

存在差异，因此候选人阵容也存在巨大差异。

2016 年，在党内提名战中输给特朗普的 16 位共和党人大多数是州长或来自大选区。10 位候选人是现任或前任州长，只有 4 位候选人是现任或前任参议员，没有候选人是现任众议员，其中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三个人从未担任过公职。此外，6 位候选人来自摇摆州，4 位来自强烈倾向民主党的州，只有 6 位来自倾共和党的州。这是一群参加过大选区竞争激烈的大选的候选人。

2020 年大选民主党候选人阵容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文章统计的 26 位现候选人或前候选人中，只有 4 位来自摇摆州。大部分候选人是亲民主党州（在某些情况下是小州）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9 位是现任或前参议员，7 位是现任或前任众议员，只有 3 位候选人担任过州长，4 位是现任或前任市长，还有 3 位来自私营部门。

2016 年共和党候选人阵容中的很多人赢得过激烈的大选，但没有受过共和党初选的考验。而 2020 年民主党候选人大多面临的问题是，除了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亲民主党的郊区和大学城等民主党大本营外，他们几乎没有在其他地方获得选票的经验。对于一个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没有在民主党大本营外赢得太多职位的政党来说，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

## 高技能移民将给美国带来更多就业

《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11 月 7 日载文称，受过教育的高技能移民不会抢走其他美国人的工作，反而会刺激经济，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美国就业市场表现强劲，在科技和医疗领域尤其如此。然而，美国政府正在加大外国人才进入美国的难度，因此这些行业可能

很快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进而带来不利的经济后果。

日益严格和复杂的移民制度导致有才能的工人前往其他国家寻找工作。自 2012 年以来，将美国作为首选目的地的人越来越少。限制净移民数量的澳大利亚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全球技术人才选择在加拿大和英国工作。鉴于外国技术工人可以增加美国本土工人的岗位和工资，这一趋势令人担忧。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美国以人才为基础的签证体系继续吸引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这样创新和经济增长才不会停滞。将现有的 H-1B 签证限额从 8.5 万个提高到与市场需求匹配的水平（约 20 万个），能够解决处理时间过长的的问题，并减少对抽签程序感到担忧的申请者面临的不利因素。政策制定者还应该考虑借鉴英国的做法，将医疗工作者排除在 H-1B 签证限额之外，就像美国目前对高等教育工作者所做的那样。

总之，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术移民不会从其他美国人那里抢走工作，而是会填补空缺，或者进行创新，刺激美国经济，从而带来更多就业机会。让美国重回充满机遇之地将是双赢的选择。

### 美专家为美 5G 发展提建议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 11 月 7 日登载该智库专家艾尔莎·卡尼亚 (Elsa B. Kania) 执笔的报告《保卫我们的 5G 未来：美国政策的竞争性挑战和思考》，分析了美国 5G 发展面临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向美国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优先考虑并投资 5G，为美国的竞争力打下基础。认识到 5G 的战略意义，优先采取旨在恢复美国技术领先地位的应对政策；针对 21 世纪数字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政府进行投资并鼓励私营部门投资，探索行业领袖和政府之间开展合作的多



种选项，以促进 5G 发展；优先考虑并加快现有计划，以消除商业创新面临的阻碍。

第二，确保未来 5G 网络在设计时就是安全的。制定严格的流程，筛选美国 5G 网络的供应商和运营商，并继续促进行业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在降低风险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探索新方法，在美国 5G 供应链以及供应商和运营商安全实践方面建立和保持更大的可见性和态势感知；开发全面的框架来评估、降低和管理未来 5G 网络面临的各种系统风险；认识到技术标准对塑造未来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并通过将安全性作为一项要求来刺激安全方面的改善；加强涉及高风险或不可信硬件和设备的 5G 网络和系统的安全性。

第三，在 5G 及 5G 以外的领域争夺领导地位，进行技术创新。探索打破现状的选项，5G 及其他领域创造新方法，包括使用更强大的网络虚拟化技术；进一步支持新技术和创新技术研究，通过频谱共享等方法提供更多可用的频谱；尽快在 5G 领域建立和拓展健康的供应链和产业生态系统；促进健全的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使新成立的公司能够充分利用 5G 的好处。

第四，加强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协调和合作创新。优先考虑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开展合作，推广安全和强调合作的 5G 发展替代方案；确保美国旨在限制或挑战中国科技公司全球扩张和影响力的政策传达到位，与国内利益相关者以及国际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协调；与北约和印太地区的盟友合作，开发安全的综合通信架构，以促进信息共享和协调；与合作伙伴和盟友合作，投资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

第五，做好准备，充分利用 5G 对国家安全的积极影响，降低其负外部性。如果中国仍是全球 5G 网络的主要参与者，为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做好准备；评估关键基础设施受到的威胁以

及涉及和针对 5G 的间谍活动和刺探活动；评估和测试 5G 在国防和军事应用方面的潜力。

## 传统基金会发布年度美国军事实力指数报告

目前美军可以在应对单个重大地区冲突的同时，参与多项行动，但无法处理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重大地区突发事件。

美国传统基金会近期发布《2020 年美国军事实力指数》报告，评估了全球作战环境、美国面临的威胁以及美国的军事实力。报告摘要如下：

美军实力指数根据现有联盟、地区政治稳定情况、美军存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状况来评估美军在关键地区作战的难易程度。评估威胁的依据是对美国重大国家利益构成挑战的行为体的行为和能力；衡量美军实力状况的依据是其能力或现代化程度、作战能力和成功执行指定任务的准备情况。

本报告将整个世界视为美军保护美国利益的环境。报告聚焦于三个地区——欧洲、中东和亚洲，因为美国在这些地区具有切身利益，且这些地区存在能够挑战美国利益的行为体。

“2020 年指数”再次将欧洲的作战环境评估为“有利（favorable）”；中东地区作战环境的评估结果是“中等（moderate）”，但该地区的政治稳定情况仍然“不利（unfavorable）”；在联盟、整体政治稳定、军事相关基础设施和美军存在等方面，亚洲仍对美国利益“有利”。总的来说，目前的全球作战环境仍然“有利”，这意味着美国应该能够在世界上任何有需要的地方投射军事力量，保护自身利益，而不会面临强烈阻碍或重大风险。

本研究关注的是较明显的和构成最大威胁的风险来源，选择的威胁行为体不包括对那些缺乏实际能力、无法对美国重要安全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棘手国家和非国家实体。总体上，美国重大利益所受威胁的综合得分为“高”（5个等级中的第4个等级，仅次于“严重”）。

“2020年指数”再次认定俄罗斯的行为“咄咄逼人（aggressive）”，其日益增长的能力“令人生畏（formidable）”（最高级别）；作为美国面临的最全面的威胁，中国的挑衅行为仍“咄咄逼人”；伊朗的行为被评为“咄咄逼人”，将其能力评为“提升中（gathering）”；朝鲜的行为被评为“棘手（testing）”；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仍被评估为“棘手”。

本研究从能力、规模和备战情况来评估美国的军事实力。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核能力的评级均为“一般（marginal）”

总之，“2020年指数”的结论是，目前美军可以在应对单个重大地区冲突的同时，参与多项作战活动，但它将很难做得更多，更没有能力处理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重大地区突发事件。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